



□ 龙 倩

“家”最早见于甲骨文，常作“𡩂”，上面是“宀”，下面是“豕”，屋内有猪之形。猪乃古代“六畜”之一，既是食物的来源，也是平民祭祀中的重要祭品，所谓“陈家于室，合家而祀”，构成了家庭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说文》释曰：“家，居也。”《尔雅》则对“家”的方位作了更准确的描述：“闾户之闲谓之宸，其内谓之家”，说“家”位于整栋房屋的最深处。故家从初义之居所，可逐渐引申为夫妇子女聚居之家庭，如孟子所言“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扩而可为家族、家产之义。在西周的礼乐制度中，“家”还与“邦”“国”相对，指卿大夫的封邑领地，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社会阶层发生了激烈的变动，“家”的指称对象也逐渐泛为一般的血缘家庭。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生命场所，家是人类文明中普遍、自然、深入而广泛的存在。世界各大文明都有关于“家”的传统，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从“家政”角度来理解和管理“家”，希伯来文明强调口头传统的“家族传承”。中华文明从最基本的伦理单位发展出“家国同构”理念，进而递至“天下一体”的宇宙认知，因此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支点。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

梁漱溟说，“中国文化自家族生活而来”，钱穆亦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这些立论均基于家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伦理单位的基本事实。在传统社会中，最基本的人伦关系有五种：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代表世代的父子关系、代表阴阳的夫妇关系和体现平等的兄弟关系这三伦均生发于“家”这一场域当中，形成了一个多样、复合的“关系整体”，而另外两伦亦由家庭类推而出，故有拟君为父、拟朋友为兄弟的说法。基于此，中国传统社会推导出君恩臣忠、父慈子孝、夫和妻顺、兄友弟恭和朋诚友信的系列德目，建构起一个人伦教化的意义世界。

与西方伦理学不同，基于人在家庭当中所切身体悟到的以血缘亲情为起点的人与人之间的仁爱之情，即《中庸》

所谓“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就是爱人，亲爱父母就是最大的仁。《诗经》中的“千古孝思绝作”《蓼莪》曾咏唱道：“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父母的“生”“鞠”“抚”“畜”“长”“育”“顾”“复”“腹”，是父母养育生命之恩的具体展开，构成了个体存在与成长的前提，也是子女感念报答之情生发的自然基础。因此，在种种仁爱的情感中，亲亲之爱不仅是形成最早的，而且是最为真诚、最为自然、最为强烈的，甚至被视为人的本性，是良知良能的表现。诚如孟子所言：“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

源自家庭的天然“亲亲”之情，最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凝结为“孝”这个重要德性，成为中华伦理体系的起点和诸德之首。孔子曾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可知孔子视血缘亲情为人生命存在的起始根源，以亲亲之孝为前提，认为弟子们只有在“入则孝，出则悌”的基础上“推己及人”，才能实现“大爱”，做到“泛爱众而亲仁”。有子更直言表明“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只有先确立了孝悌之本，仁道才能生发。孟子则不仅把与孝相关的“父子有亲”作为“五伦”之首，列于“君臣有义”之前，而且将“仁义礼智”的本质都归结为事亲从兄，指出“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事，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将亲亲之孝达于天下则自然而然会实现“仁者无不爱”的道德境界。秦汉之际的《孝经》则把一切美德统摄置于孝德之下，认为孝是修身之根本、家庭道德之首务、社会政治道德之基石。自此，孝真正被确立为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元德”，“家”也正式成为德性涵养的始源地和入伦秩序建构的基础。

家国同构

西周分封建国所奠定的家国一体的社会架构直接决定了中国传统政治是一种伦理型政治，政治建立在伦理的基础

上，伦理的原理直接上升扩展为政治。依此逻辑，政治以伦理为本位，伦理以家庭为基础，家庭以亲亲为起点，家庭中的亲亲，便构成社会政治的尊尊、际际之间的长长。《礼记·大传》曰：自仁率亲，等而上之，至于祖；自义率祖，顺而下之，至于祢。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这段话非常清晰地展示了周代宗法制度如何从亲亲走向尊尊的社会历程，建构起一个从家庭、家族到国家相互贯通的伦理规范体系。

在这里，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一切社会关系以家庭关系为原型，一切社会生活以家庭生活为基础，一切社会伦理以家庭伦理为起源，伦理与政治高度合一，孝与忠可直接贯通。因此，《大学》首章明确把“治国”“平天下”视作“齐家”合乎逻辑的扩大与延伸，又说“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孟子·离娄上》则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孝经》更是以孝为最高价值，并“移孝作忠”。如《开宗明义章》：“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士章》：“以孝事君则忠。”《广扬名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形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不唯家庭伦理之孝与政治伦理之忠，兄弟伦常与长长行为，而且理家与官治都可以通过亲亲原则而打通。忠孝一体、家国同构成为理解中国古代伦理政治的关键，家也因此取得了塑造社会政治秩序的根本意义。以是，“家国”二字，在古往今来的连用中积淀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家国情怀，也成为中华政治文明的重要表征。

天下一家,万物一体

“家”在中华文明中的特殊地位不仅囿于伦理与政治，更在于它构筑了华夏民族对宇宙、世界乃至天下的独特理解模式：天下一家，万物一体。在华夏民族的大经大法中，要数《周易》最早

以“家”的方式来表达与宇宙万物的关系。《序卦传》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天地，即乾坤、阴阳。阴阳相交而生气与万物，万物之中最为灵贵者则为人，故“有男女”，男女必相合而走向家庭，故“有夫妇”，夫妇孕育子女，而成人伦之始，故“有父子”。可见，从宇宙论来看，“家”的存在并非偶然，而是阴阳生生必然产生的生命结构，是“生生”之形上预设的现实载体，宇宙秩序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围绕“家”而展开。

宇宙本身“生生不息”通过家庭化结构得以呈现，在这种宇宙观下，人们所面临的世界便不是冷冰冰的、异己的陌生世界，而是充满着亲情、温暖及相互关联的“家”的世界。宋儒张载在《西铭》中对具有形而上依据的“天下一家”进行了阐释：“乾称父，坤称母……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宇宙是一个大家庭，不仅化育万物，也化育万物之首的人，世间万民都是我的同胞，天下万物皆是我的朋友。

正是在这种宏阔的思想范式下，中华文明提出了社会政治与世界秩序的理想，即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从子夏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再到《礼记》的“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入”皆是对这一理想的不同表达，将从家庭场域中所生发的天然团结、相亲相爱和守望相助的善意，拓展到家庭之外，延伸到社会政治乃至更广阔的天下。

总之，通过“家”这一支点，家、国、天下相连缀，“我”与世界相勾连，身心与家国相贯通，再递至天下，融个人修养、家庭伦理、政治想象、民族理想和世界图景为一体，塑造了中华文明即微即宏、豪迈旷达、温煦正义的独特气质。



（三）

15 世纪初，郑和航行到非洲东岸，顺路开辟了至印度西南岸购买胡椒的最短路线。15—16 世纪，中国在东南亚收购的胡椒年达 5 万包（250 万斤），等于 17 世纪上半期胡椒从东方输入欧洲的总数。

郑和下西洋，进一步开拓了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贸易关系。中国对胡椒的大量需求，导致了爪哇和苏门答腊胡椒种植的增加，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市场的扩大与交换关系的发展。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胡椒也由珍品逐渐变为平常百姓都能用的日常用品。“时乡人宴会，多末胡椒置羹碗中，以为敬同坐者”。既往专为统治者所享用和垄断的胡椒，逐渐被与平民百姓相关联，“往日多载奇珍，今系日用杂物，今昔殊异”，“遍中国食品，为日用之物也”。

胡椒渗透到饮食的方方面面。明代饮食类著作如《遵生八笺》《竹屿山房杂部》《易牙遗意》等多有利用胡椒烹饪的记载。胡椒从海路进入西方，比中国晚了近 1 个世纪。1498 年，达伽马抵达古里。开创了胡椒首次直接经由纯海路自印度输入欧洲的历史。东方与西方，因胡椒在古里交汇，共同见证了大航海时代在此拉开帷幕。



王阳明诗歌流传至今的有 600 余首，诗思互鉴，阳明诗歌既是阳明本人心志情感的体现，也是心学智慧的载体。

诗中有情,情深而正

对友人的同道情。阳明一生结交以同道为志，所以多诤友，即使有学术思想见解的不同，亦君子之交、真心相待。与阳明同时期，亦是明代大儒的湛若水是阳明的同道之友，青年时共同讲论圣人之学，阳明曾给湛若水赠诗云：“忆与美人别，赠我青琅函。受之不敢发，焚香始开缄；讽诵意弥远，期我濂洛间。道远恐莫致，庶几终不断。”时年 36 岁的阳明被贬龙场，离开北京后，好友湛若水模仿屈原写《九章》送给阳明，阳明写《八咏》共八首诗回复挚友。落难之时，人人唯恐避之不及，朋友来相送，并致书信相勉励，阳明感到无比珍贵。颈联中濂洛关闽为宋代道学的代表，阳明与湛若水同道于圣贤之学，诗歌表达了阳明谨记好友的期待，求道之路有同道相伴，更当弘毅而行。

对弟子的师生情。阳明一生致力讲学，其心学思想是经历了生死考验的体悟而来，具有简易直截、融会贯通、打动人心的特点，加之阳明为人温和随性、随缘指点，极具人格魅力，所以弟子众多，而且吸引了很多平民百姓，在当时与后世都极具影响。阳明的诗歌中体现了其对弟子深厚的师生情谊，如《诸生》诗：“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胡不携书来，茆堂好同住！”阳明有多篇给诸生之诗，他与学生之间亦师亦友，同住同住，可酒可乐，诗歌不仅记述“不记西园日，桃花夹川路”的讲学书忆，更是在情感的追忆、不舍中寄托对后生求学问道的勉励期待。

对百姓的真性情。心学智慧的根本精神是“己溺己饥”之念、“民胞物与”之怀。阳明一生为家国百姓承当，他与百姓的交往诗歌还体现了阳明对百姓和乐、坦荡、随性、自然的真性情。如《夜雨山翁家偶书》所言：“洗盏对酬酢，浩歌入苍茫。醉拂岩石卧，言归遂相忘。”诗歌记述了阳明偶遇山中老翁，邀约一同喝酒，阳明自己却不胜酒力，再次喝醉，于是干脆躺在石头上，忘却回家。诗歌既有杜甫“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的真情，又有王维“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的随性，体现阳明与民同乐、其乐融融的儒者心怀与人格气象。

诗中有志,志大而实

立志广大。阳明少年时即立志学做圣贤，其一生对天理人心、良知知行的探寻，都以立志为根脉。立志首先要大，这个大是家国担当的大、圣贤志业的大，而超越小我的私利私欲的满足。《月夜二首·与诸生歌于天泉桥》中说，“须怜绝学经千载，莫负男儿过一生。影响尚疑朱仲晦，支离羞作郑康成。铤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这正是对曾皙之志的肯定与追慕，其志虽狂，却体现了天地精神之大、儒者心怀之真，也是阳明人生志向的说明。“六经散地莫收拾，丛棘被道谁刊删？”王阳明不满后儒只为追求功名的“六经”传承方式，使经典文脉如荆棘满山、杂草丛生而无人修剪，自己则要破除迷妄，直续孔孟真精神，体现其志向如“高樓撞晓钟”一般的勇毅担当。

志向唯实。阳明倡导立志、立大志，但志向指向的是经世致用的实在事功，“道痼念同胞，至人匪为己”，“瘡痍著形迹，期无负初心”，“要使吾心不负初”等诗，都表达了阳明立大志是为印度输入欧洲的历史。东方与西方，因胡椒在古里交汇，共同见证了大航海时代在此拉开帷幕。

王阳明诗歌中的人生智慧

□ 胡晓艺

致力“事上磨练”，注重“言语正到快意时，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气正到发扬时，便翕然能收敛得；愤怒嗜欲正到沸腾时，便廓然能消化得”的“良知一提醒”的工夫。在最艰难的日常事务中磨练心志，是理解阳明心学精神的重要维度。

诗中有道,道精而微

良知与易。“绵绵圣学已千年，两字良知是口传”，良知之学是阳明心学的精神核心，阳明感悟良知之说既来自于孟子的“良知”“良能”之说，也与体悟易道精微有关。阳明以良知为人人本自具足、先天而在的人性品质，并为贯通天地人物的本体存在，与《周易·说卦传》中的“先天”之教的说法是一致的。所谓“乃知先天翁，画画有至教”，阳明感悟易道精微，寻此先天之说而入良知之教，以正人心、生信心，在诗歌中多有记载。其中最脍炙人口的关于《易》的诗是：“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出自《别诸生》。阳明认为，良知既是心之本体，又构成人的道德本心，良知既是本体存在，又是发用流行的。良知时时刻刻都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主导着人们的行为意识，引领人们行大道。“不离日用常行内”，注重人伦日用、脚踏实地致良知，正体现阳明心学的重要特质。

心与境。阳明心学的根底是人心的良知本体、吾性自足，由此德性光辉而生发出一种心物感应的天地境界。好诗往往有景，而景能否生境，往往并非取决于景物描写的高下，而在于诗人体道之心的深广。哲学家汤一介说中国文化精神有三个“合一”，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和情景合一。阳明不仅是知行合一的倡导者，而且其思想境界正是天人合一、情景合一，天人合一是心外无物、情景合一的本体基础，这在阳明诗歌中多有体现。阳明少年时写月，“若人有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圆”，境界的本义即是眼力所见时空的广远，阳明自小立志成贤求道，这首诗体现出其心志远大，虽有少年狂气，但俯临万物，心生物境。阳明中年时写月，“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这是在躲避刘瑾追索，漂荡到武夷山的一野寺中所作的《泛海》诗，展示出一派纵横天地独往来的阔然气象。阳明晚年写月，“吾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团圆永无缺”，月的光明来自本心良知的纯粹真诚，心境的阔大根源于体道的深广，方能见月明之圆满。诗歌表达了阳明心学的精神：一切境的广远、物的光辉，最终都是涵养人心的光明、人生的“明白”。

胡椒在中国的流行史

□ 吴登峰

葛洪在《时后备急方》中，留下胡椒药用的最早记载：“孙真人治霍乱，以胡椒三四十粒，以饮吞之。”苏恭在《新修本草》中提到胡椒“味辛，大温，无毒。主下气，温中，去痰，除脏腑中风冷”。李珣在《海药本草》中对胡椒药物属性进行了进一步分析，指出胡椒“去胃口气虚冷，宿食不消，霍乱气逆，心腹卒痛，冷气上冲，和气。不宜多服，损肺。一云向阴者澄茄，向阳者胡椒也”。与胡椒有关的药方有“胡椒丸，专治疗咳上气喘满，时复呕沫方”，“胡椒理中丸：疗咳嗽逆气，不能饮食，短气方”。

《新唐书·元载传》记载：“籍其家，钟乳五百两，诏分赐中书、门下省官，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称是。”权臣元载如此大量屯积胡椒，可见当时胡椒之稀贵。后人形容元载利令智昏：“惟患生贪，贪转生愚”。“胡椒八百斛”在苏轼等文人笔下，成为抨击权贵骄奢淫逸的典故。

（二）

北宋时期，胡椒贸易扩大，东南亚各国使节来中国时，经常以胡椒作为贡品。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引述官员的话：“（杭州）市内每日胡椒用量多达 43 车，每车重 223 磅。”一艘中国式帆船可装载多达“五六千篓胡椒”。

宋、元时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胡椒等价金银，马可·波罗通过对胡椒的描述，充分展示中国的富足。

在 16 世纪前，胡椒常被用作借贷和



胡椒被誉为香料之王，是热带常绿木质攀援藤本植物，原产于印度西南海岸喀拉拉那一带。在汉、晋时期，胡椒经波斯商人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因波斯商人垄断，胡椒被称为“金丸使者”，价格昂贵、等价黄金，成为地位与财富的象征。进入明朝，特别是郑和下西洋后，胡椒沿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进入中国，逐渐从官廷普及到民间、从药材演变为食谱，与油、盐、酱、醋一起铸就舌尖上的中国美味。

（一）

中国古代习惯于对移植于外国的植物名称前加“胡”字。在中国典籍中，《后汉书》对胡椒进行了记载：“天竺国……有香、石蜜、胡椒、姜、黑盐”。《酉阳杂俎》中，更是将胡椒的产地具体到“出摩伽陀国，呼为昧履支”。

胡椒被引入中国后，最早被宫廷、门阀贵族用于肉食上的调味，以去除羊肉肉的腥膻之气，时人称赞“香美异常”。但直到明以前，胡椒因价格昂贵，仅限于宫廷与权贵等少数人使用。胡椒引入中土后主要作为药物为人所识，广泛用于消痰、下气、补虚。